

譚家健 主編



历代骈文名篇注析

责任编辑：宋效永
装帧设计：方绍武
书名题字：诸卫国

历代骈文名篇注析

谭家健 主编

400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7—80535—013—2/I·3

定价：3.30元

编 选 说 明

一、本书选录自汉至清历代骈文名作五十八篇，企图向读者比较系统地介绍骈文发展和演变的大致面貌，比较具体地反映骈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对于其繁盛期——南北朝和初盛唐时的作品，固然选录较多；对于其衰落期——宋以后的作品我们也给以充分注意。四六体骈文固然被视为主要型态；对于非四六体的骈文（如四言体、骈散兼用等等），我们也酌情选录，以见其多样性。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作品无疑是入选的首要条件，有些二者未能得兼但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作品我们也给以一定的地位。

二、骈文大多用典繁密，修辞华美，一般读者阅读理解不无一定困难。本书注释，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为原则。对于生僻的字词，皆注明音义；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皆作必要介绍；典故成语，尽可能讲清基本含义并交待出处，一般不抄引出典原文，不作旁征博引的考证；难句释意多采用意译，偶尔也用直译，两句以上者有时用串讲法解释。少数费解的片断还加释段意。古代骈文作家往往喜欢化用经典旧文，有的旧注也喜欢字字考究其来历，这样做对一般读者并无必要，而且不胜其烦，所以我们只能择其重要之处作适当的说明，以避免繁琐。

三、本书所选文章，每篇均有简要评析，介绍作家生平和写作背景，评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后者尤其是重点所在。为了便利鉴赏，我们有意收集、引述一些古代评点家的评语。这

些意见,言简义赅,切中肯綮,往往深得三昧,相信今天的读者会感到兴趣的。由于篇幅有限,本书的分析不可能十分详尽,也许难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要求。又由于各篇原作文字难易程度有别,艺术价值不一,因而分析介绍的详略也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参差和侧重,希望读者鉴谅。

四、本书选目和体例主要由主编负责,注释和分析主要由各撰稿人负责,全书由主编审阅并统一修改加工,最后由出版社复审。其中有些问题是经过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有些问题还来不及仔细交换意见。疏漏、讹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方面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在本书选注过程中,曾经参考并吸收了目前已出版的一些选本的成果,尤其是叶幼明、黄钧、贝远辰三人的《历代骈文选》,对我们有不少启发和借鉴,借此机会谨向他们以及其他有关的作者一并致谢。

历代骈文发展概述

(代前言)

谭家健

骈文，也叫骈体文，是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以对仗、骈偶、用典和有一定声律为主要特征。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出现过不少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骈文的萌芽和形成

如果说对偶骈句就是骈文的萌芽，那么它很早就存在于古代散文和诗歌中了。例如《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大禹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禹贡》）。《周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文言传》）。《诗经》里的对句更多，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谷风》）等等，不胜枚举。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常常采用对偶和排比的句式。如《左传》中的《吕相绝秦》，连用十几个四言排句。《国语》中的《伍举论台美》，大量使用骈偶句式。而象《荀子·天论》中的“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

妖怪不能使之凶。”《战国策·赵策》中的“古今易则，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些片断，已经是很整齐的骈文。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骈俪色彩也很浓重。其中从“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日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一直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几十句，排比对仗，十分工整。清人李兆洛竟认为是骈文嘴矢，而将其选入《骈体文钞》。

汉初文章，首推贾、晁。贾谊《过秦论》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富于气势，长于排比。晁错《言兵事疏》将中国形势与匈奴对照，几乎全是偶句。但二文都还不够整齐，所以《骈体文钞》不曾收录。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广引譬类，与李斯同风，而辞意更形复沓，俨然形成一种偏习，骈体之经脉隐约可寻。西汉中叶，辞赋发达，波及散文，奏疏书信，益趋富赡。如刘向《论起昌陵疏》：“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条灾异封事》：“执狐疑之心者，未谄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对仗精细而析理严密，后世骈文家（如陆贽）深受其影响。不过，西汉文章中的骈句依然只是偶尔使用，在全篇中并未占主要地位。到了东汉，文风渐趋绮靡，散文中的骈句越来越多，汉末尤甚，蔡邕的作品是其典型。如《郭有道碑》，几乎通篇皆用骈句，渊雅肃穆，典重茂密，而且音调铿锵。如“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是纓纓之徒，绅佩之士，

望形表而景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象这样的文章，有人认为已经是纯乎为骈文立格了（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王闿运所谓“骈俪之文起于东汉”（《湘绮楼论文》），正是指蔡邕等人的作品而言的。

不过，统观先秦两汉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之对比，不尚字句之雕琢，风格质直浑厚。除个别外，大多数文章还是以散体为主，或骈散间杂，难以截然划分的。

建安三国，文风通脱，较之东汉有所不同。内容更加丰富深刻，形式越发自由多样。如曹操、诸葛亮的文章，基本上不用骈偶，这是当时的主流。与之同时，追求辞藻讲究字句的风气仍然存在。如陈琳的檄文，铺张扬厉，骋辞使气，较战国纵横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为袁绍檄豫州》，历数曹操种种劣迹罪行，使其奸恶面目暴露无遗，读来令人扼腕。他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是情文并茂的抒情文，“抚今追昔，一往情深，尺幅之中，有无穷感慨”（孙月峰评语）。曹植的表章书信，情采绚烂，才华横溢。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与吴质书》，以及吴质的《答东阿王书》、应璩的《与侍郎曹长思书》等，骈俪色彩都很鲜明，实为骈文之先导。但其时风格，仍是以气运文，骈散兼取，既呈现出富赡匀称之美，又贯注着疏畅谐婉之气，既不似东汉之凝重，又未如六朝之轻靡。

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词属对的成分加多，已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如《豪士赋序》：“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其中“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摘取《左

传》成语，用卫宣公与宁氏分权故事。“君爽”二句，用周公摄政，召公不悦旧典。“高平”二句，用霍光与汉宣帝故事。整个这段文字说明大臣权重，必然引起君主和同僚的猜嫉。含义深切婉转，隶事繁富贴切，句式均为娴熟的四六体，裁对工整，用词造句，紧紧相对，骈文的主要特征至此已完全具备。其他如《吊魏武帝文》，评价曹操的功业；《辩亡论》总结东吴灭亡的教训，仿效贾谊的《过秦论》；《荐戴渊疏》向赵王伦推荐处士戴渊；这些文章都是很成熟的骈文。与陆机齐名的潘岳，长于哀诔，如《马汜督谏》、《夏侯常侍谏》等，序文中都有一些对句。此外，刘伶的《酒德颂》、李康的《运命论》、江统的《徙戎论》、刘毅的《请罢中正疏》，都是当时著名的文章，都很喜欢采用排比，不过，都不如陆机文章那样完全骈偶化。

西晋一代文风，总的看来还是散多于骈。尤其章表政论，大都不讲藻饰，只求说理达意。然而骈文毕竟已经形成，尽管还是处在襁褓之中。

东晋比之西晋，骈化进程放慢了一些，散文大家以王羲之、陶渊明为巨擘，仍然继承汉魏遗风，文字以自由洒脱取胜。有的以散体为主（如《兰亭集序》），有的完全不用骈语（如《桃花源记》）。骈体作品多在应用文字方面，如温峤的《让中山监表》、庾亮的《重与陶侃书》，孙绰的碑铭等等，但影响不如散文大。学术议论文字中有少数也用骈体。如《抱朴子·诘鲍篇》所引的《无君论》，这是一篇声讨君主专制制度的檄文，揭露犀利，行文泼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游记文字有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的山水游记，于细致的写景中寄寓佛理，同时渗透着游人的欢悦心情，技巧比《无君论》更为娴熟。总之，两晋时期的文坛，骈散都在发展，虽然分道扬镳，但还没有形成对抗。

骈文大盛，独占文坛

骈文的真正兴盛，是在南北朝时期，尤以南朝为最。

晋宋之际，工整华丽的山水诗代替了平淡无味的玄言诗。与此同时，骈文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刘宋文章，用典逐渐增多，已达到“殆同书抄”的地步；句子愈益整齐，但散句还是不少。代表作家有颜延之、鲍照等。颜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全以属对为主，已纯是四六文字。其《陶征士诔》赞扬陶渊明的高尚情操，是后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这时的章表诏诰，已通用骈体，书信则尚多散语。象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恐怕是我国文学史上以书信作游记的第一篇。文章依次铺陈东西南北景物特色，显然受了当时辞赋（例如郭璞的《江赋》）的影响。鲍照的《瓜步山揭文》，借景抒情，充分体现了作者自己的个性。

齐和梁初，由于诗歌中永明体的启发，骈文开始有意讲究声律，这是前代所未有的。这一时期的著名骈文作家作品很多。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以嘲讽的口气，假托钟山之神灵，谴责虚伪的隐士，自始至终，对仗工切而且音韵和谐，是传颂千古的名作。谢朓的《拜中书记室辞隋王笺》，辞意委婉，造语精妙，也很有特色。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其中佳句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自然真切，很能勾起乡思，终于感动叛离祖国的将军陈伯之，使他幡然悔悟而决意南归。刘孝标的《广绝交论》，痛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烛照各种趋炎附势丑类的灵魂，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而象刘令娴的《祭夫徐敬业文》，哀婉凄绝，技巧十分纯熟。梁代除家书之外，一般书信已通行骈体，而且出现了一批隽永的山水小简，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是。即使学术著作，也有采用骈体

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即是。后者已设专篇总结骈文的写作经验。

梁后期和陈代，骈文进入高潮。梁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骈文能手。在他们提倡之下，南国文事特盛。这时文章的特点，一是用典激增，以致晦涩；二是四六句型渐成常规；三是雕琢之风大盛。代表作家首推徐陵、庾信，后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徐庾体”。庾信早年生活在梁朝，后来羁留北方。其骈文名作有《哀江南赋序》，这篇文章首先叙述自己在侯景之乱中由金陵逃往江陵以及后来被留在西魏的经过，接着点出作赋的立意，然后反复陈述梁朝的败亡和自己被迫出仕异朝的痛苦心情。手法采取夹叙夹议，运用大量历史典故，曲折而深沉地表达他那无可奈何的思想感情。语言雄健清新，笔势纡曲转折，用典含蓄贴当，细腻地体现了难言之隐。他的应酬小简也多有精品。徐陵的骈文名作是《玉台新咏序》，语言华美，风格纤细，技巧高超，然而其内容主要是描写宫廷妇女生活，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后期作品《与杨愔求还书》，反映了对故国的怀恋思念之情，受到人们的好评。在徐、庾以前的骈偶，常见的是上下句相对，且多用四言句。从徐、庾开始，到以四六句平仄相间作对的新风，这就更加灵变多姿，和谐悦耳了。南朝的后期，骈体的应用范围还扩大到历史论文（如何之元《梁典·总论》）和哲学辩论（如付繹《明道论》）。文笔之分，骈散对立开始出现。骈文被称为“今文”、“今体”，散文被称为“古文”（见萧纲的《与湘东王书》）。骈文中忽视内容，单纯追求形式，“争一韵之奇，竞一句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等等不良倾向越来越严重。批评骈文的意见随着产生（如裴子野《雕虫论》）。

十六国时期，北方有些地区（如凉、秦、燕）文化颇高，与南方差别不大。北魏前期，汉化较浅，骈风不畅。迁都洛阳以后，

随着孝文帝提倡汉化，骈文逐渐流行开来。但公文中仍多用散体，著作中则以散驭骈，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东魏北齐，文人比较集中，吸收南朝文化较多，骈文成就颇高。如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以退隐山林为乐，脱离官场为安，情趣与南朝某些文人并无二致。清人许梈称赞他：“旷怀雅量，弥率弥真”，“幽峭玲珑，饶有两晋风力”（《六朝文絮》）。西魏北周，文化稍逊一筹，虽有几个骈文作家，都是南朝去的。除前面提到的庾信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王褒。其《与周弘让书》，倾诉对故国的无限思恋而不可能还乡的哀婉之情，十分动人。与他的朋友陈朝周弘让的答书堪称双璧。骈散之争也由南朝扩展到北朝。北周统治者宇文泰为了反对浮华的骈体，曾下令苏绰仿效《尚书》体写作公文，并在全国推广。由于脱离现实太远，结果行不通。

隋朝统一南北，北齐和陈的一些作家先后来到长安，一时人才济济。著名骈文如卢思道的《劳生论》，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是北朝文章的压卷之作。隋文帝承接北周遗风，继续清算骈文中的形式主义，曾根据李谔的建议，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可是同样没有收到效果。不久，炀帝即位，文风又恢复到南朝后期。不过，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却出现了一些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迥异于当时的战斗性极强的骈文，如祖君彦的《为李密檄洛州文》就是。文章列数隋炀帝十大罪状，真是淋漓尽致。其中名句如：“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经常被后人援用。

初盛唐时期，骈文继续盛行。

唐太宗开弘文馆，集虞世南、许敬宗等十八学士，文风沿袭江左，所作皆绮章绘句。唐初官修各史，论赞悉用骈体。紧接着，出现了所谓“上官体”，代表作家上官仪，诗文均极秣艳，形式上严守四六，极少散句，平仄协调，音节和谐，词藻比“徐

庾体”更华美，不过丽而不道，更多甜俗气。

稍后，出现了著名的“初唐四杰”，他们都是骈文大家，尤其是王勃、骆宾王。他们的文章和“上官体”有很大不同，内容比较充实，能反映某些社会和人生问题，有一定真情实感，有时甚至愤世嫉俗，慷慨激昂。风格清新，洒脱自如，一反当时迂缓、柔弱、浮夸之风。语言精美，用典贴切，不做作，不堆砌，平仄四六排列整齐，错综而有规律，读起来朗朗上口。他们的名作可以代表中国骈文的最高成就。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花团锦簇般的文字，极力描写滕王阁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胜迹、古今人物和楼台之美、宴会之盛，并即景生情，抒发他自己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情绪。文笔生动，意境高雅，结构庞大，层次清晰，前后呼应，似乎一气呵成。许多名句，传颂千古，几乎家喻户晓。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句子，备受当时和后人称赞。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个人（指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社会动态，很可以读。”骆宾王的名作《讨武曌檄》，列举武则天种种丑恶行为，号召各地起兵勤王。文章简劲有力，不象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那样大肆铺排，而是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不以用典繁密取胜，而以气势磅礴见长。名句如：“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啁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都具有很大的煽动力。所以连武则天读后也不得不赞赏他的才华，感叹宰相失人。象王、骆这样的骈文，显然与六朝文大不相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老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以上均见逢先知《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载光明日报1986年9月7

日)

玄宗时，风气有所变化。《新唐书·文苑传序》指出：“上好经术，厌雕琢，崇雅黜浮，气益浑雄，则燕许擅其宗。”“燕”指燕国公张说，“许”指许国公苏颋。他们都反对华而不实，都是当时骈文大家。张说的碑铭文字，气象宏阔，典雅壮丽，淡泊中有醇厚意味，自然中有雍容华贵气象。其表章中有不少佳作，如《请不从灵驾表》，反对唐中宗兴师动众从长安到洛阳去迎接武后灵驾。内容堂堂正正，文字踏踏实实，没有一点浮词费语，是盛唐骈文中不可多得者。盛唐时期学术著作也有用骈文写作的。如刘知几的《史通》，既是史学巨著，也谈到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对浮夸模拟之风多有不满。盛唐诗人也有不少兼擅骈体，如李白、王维等人即是。

与骈文发展的同时，古文运动已在逐步酝酿。先后提倡者有陈子昂、肖颖士、独孤及、李华、梁肃等。他们强调文章必须复古，主要偏重于内容方面的革新，并不否定骈文本身。有的人还写出了很好的骈文。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就是。作品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性，反对不义之战，主张宣文教，施仁义，行王道以统一天下，巩固边防。结论是“守在四夷”，即与边境各国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此文用典很少，变四六句为四字句，处处押韵，音节铿锵。情文并茂，风格和初、盛唐骈文迥异。说明这时的骈文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骈散反复斗争时期

骈散之争，中唐时期达到高潮。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散文夺回了失去几百年的正宗地位，影响比过去扩大了。自韩愈以后，骈文缩小了地盘，仅流行于奏议诏诰，而书信、吊祭、碑传、著述之属，多用散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骈文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其势力依然是不小的。

与韩愈大体上同时的中唐骈文大家是陆贽。他的文章以奏疏最出色，建言切实，持论笃正，“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官商协调。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陆贽谥号）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旁及景物，则兴会如腾；远计边陲，则武将森列”（孙梅《四六丛话》）。其名作如《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一篇替唐德宗拟的自我检讨。佳句如：“长于深官之中，暗于军国之务”。“不知稼穡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朕实不君，民则何罪？”出入经史而明白晓畅，纯任自然而真挚悱切。据说诏书一下，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激发。又如《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向皇帝指出，如果只顾眼前利益，扩大皇帝私库，势必财聚民散，自食鼓乱强取的恶果。文章运单成复，用散文手法写骈文，既保持排比铺张的特点，又有一种疏朗畅达的新气象。骈文发展到陆贽，实为一种转折点。前乎此者，多咏吟哀思，摇荡性灵之作。自陆贽移以入奏议诏书之后，骈文不但可以抒情，可以写景，而且大量用于说理。故骈文形式虽未变，而其性质与内容均已改观。所以，他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与古文家并不相上下，实为宋四六之先声。苏轼的奏议就处处效法他。陆贽之后，古文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也写作骈文。著名的《陋室铭》就是刘禹锡的杰作。柳宗元为南霁云所作《唐故特进南公睢阳庙碑》，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重视。

晚唐古文运动趋向式微，骈文东山再起。作者很多，集大成者是李商隐。由于他把自己的骈文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于是后世遂称骈体为“四六文”。李商隐的骈文以书启为佳，尤善揣摩人情，代人哀则哀，代人谏则谏，用典贴当，无生吞活剥之嫌。“其声切无一字之螿屈，其抽对无一偏枯，手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四六丛话》）。在李商隐稍前有令狐楚，长于笺奏

制令，《旧唐书》说他是“每一篇成，人皆传诵”。与李商隐同时的还有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皆擅四六文而又都排行十六，故时人称其文体为“三十六体”。

北宋初年，文坛承袭晚唐五代，专宗李商隐。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所谓“西昆派”，多陈辞滥调，鲜见新意，不切实用。于是欧阳修、苏轼等又掀起第二次古文运动。由于欧、苏创作经验更为丰富，且政治地位优于韩、柳，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配合理学的兴起，终于使古文不但夺回而且巩固地占据了文坛正宗地位。但骈文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居客位而已。欧阳修、苏轼本人即四六能手，人称欧苏“新骈体”。程果说：‘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现机抒’（《识孙梅〈四六丛话〉》）。欧阳修痛革西昆末流磔裂怪诞之迹，欲使文体复归于淳美雅正，故所作骈文多出自胸臆，不肯蹈袭前人，即使熔裁古语，也多出以自然，绝不见牵强之迹。内容渐趋实际，色彩渐趋平淡，清空流转，纤徐委备，抑扬爽朗，别具风格，从而奠定了宋四六的基础。苏轼的骈文，以气运文，能藏曲折于排荡之中，用典不多而务必精当，语虽偶出而求其畅达，不事藻饰而愈见庄重，如《贬吕惠卿制》即是。而象《答丁连州朝奉启》，则流利而婉折，深沉而真切，命意如行云流水，风格同乎其散文。王安石的骈文，也“纯是宋派”，“不甚用典，纯以气行，词意易于周达”（王菽原《四六精选》）。

南宋时期，社会上大体是骈散并行，有时甚至骈盛于散。著名作家首推汪藻，以及周必大、王安中、洪皓、陆游、范成大等。汪藻的骈文，“文从字顺，体质浑然，不见刻划，如金钟大镛，叩之辄应，愈叩而愈无穷”（孙覿《浮溪集原序》）。“叙事精详，情文委婉，颇足与欧苏相抗衡”（王菽原《四六精选》）。如《隆祐太后告天下手书》，层次分明，立言得体，气势又极悲壮。其中的名句如：“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祖之

心。”“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罗大经《鹤林玉露》称赞说：“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周必大的作品如《岳飞叙复原官制》，也有这样的特点。大诗人陆游的骈文，“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宋末年，民族矛盾严重，不少人用骈文写下了充满爱国主义的作品。如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充分体现了艰苦抗战、至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新四六。

宋代四六文应用比唐时狭隘，仅流行于诏制表启之属。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使得两宋骈文都有散文化的趋势。后人概括宋四六的特点是：多用散句、虚字、语气词以增强文气，爱剪裁大段经典文句成语代说己意，经常以阐发议论为能事，以属对精巧为工切，即使虚字也要求对偶。不少人爱用长联，突破了四六句型的约束。如苏轼《乞常州居住表》：“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行法也，如父母之遣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周南仲《追贬秦桧制》：“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这样的句子与散文实在没有多大区别。宣和以后此风尤甚，少数长联有多达十余句的，已开后世八股文之先河。

北宋末年，开始出现专门评论骈文的学术著作，如王铨《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从南宋开始，“散文”一词正式流行，也有了评论散文的专著，如陈骙的《文则》、李涂的《文章精义》等是。

骈文的衰落和“中兴”

元代通俗文学成就较大，诗词散文尚有可观者。骈文则率多佻巧，卑冗琐杂，有独创性的作品很少。知名作家有郝经、戴表元、虞集、姚燧、袁桷等，不过他们都是首先以散文名家的。元初有一部分宋遗民，继续用骈文写作充满民族思想的作品。如王炎午的《望祭文丞相文》，含蓄而曲折地表达了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崇敬和悼念。后来这种作品愈来愈少。戴表元的书信，端正笃实，但词语奥涩。柳贯的骈文，古朴可读，但缺乏生气。而象欧阳玄的《刘静修先生画像赞》，实际上是骈文小品，主要颂扬好友刘因的高雅品质，笔法活泼，虽有对偶，但并不严密，和散文体制十分接近，显得别具一格。康晔的《谢严东平赐马启》，全文紧扣“马”字，结合自身生发感慨，既歌颂对方名高齐驱，德大鲁骊的治绩，又抒写自己材质无良，志同厉驾的潦倒心情，比起庾信同类应酬小简显得更有思想深度，是当时不可多得者。

明代骈文亦少佳作。初期有刘基、宋濂、解缙等，而后有李梦阳、何景明以及王世贞等。他们都是古文家，提倡复古，同时也写作骈文，不过摹拟《文选》而已。明代制诰已不行骈体，唯公私小简有人还喜欢采用俚句（如归有光），但多因循，罕见新意。明末陈子龙的骈文比较有名，如其《讪蜂文》，以蜜蜂比喻终年劳碌不得温饱的弱者，用嘲讪的口气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全篇以四言为主，风格近乎魏晋之际文字。明末农民起义军也用骈文作宣传品，如牛金星所拟《讨明檄》即是。此文政治影响很大，但文字技巧上比起隋末祖君彦的《为李密檄洛州文》显然简易得多。

清代考据之学极盛，文人强调学有本原，以熟记典故为博